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郑永扣 郝 涵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摘 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国家治理实践活动具有理论支撑、价值整合、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在西方治理思想的影响下,重视技术应用、轻视思想引导的论调时有出现,对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转变意识形态工作视角、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在国家治理中用好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推动国家治理目标的全面实现。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功能;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1-0037-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条件下,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历史性转变,国家和社会面临更深层次的转型和改革。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课题。然而一些学者从西方治理理论出发,认为在重社会、轻政府的现代治理理论框架下,需要弱化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阶级国家理论,而应该把国家治理的重心放在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方式运行国家治权上,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效性。之所以出现如此论断,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实践功能存在误解。因此,有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解进行理论梳理。明确在当前我国国情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实践活动的重要价值,从而通过多种途径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更好地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

一、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阐释和实践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把握的概念”^[1]。当前世界普遍共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经

不是“意识形态”一词提出者法国学者特拉西眼中的观念学或者纯粹的认识论学说,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政治理念、利益诉求或国家意志的观念体系。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起初并不看好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对意识形态的使用最早是从批判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开始的,他以“虚假观念”“倒立成像”表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讽刺。当然,尽管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是虚假和错误的,他们依然肯定了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不过出于阶级立场和利益的局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歪曲的。

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转变了对意识形态的态度,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肯定了它对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重要价值。马克思也曾提出,广大无产阶级必须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2]11}。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列宁充分论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革命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指导俄国

收稿日期:2017-12-27
基金项目: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YSXT-2017-001)
作者简介:郑永扣(1954—),男,内蒙古卓资人,教授,从事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研究。

工人阶级运动中。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和工具性明确表达出来,但他们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对意识形态功能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的主要是阿尔都塞、齐泽克、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阿尔都塞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层次的划分,提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它与强制性国家机器共同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葛兰西把由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组成的市民社会称为“社会水泥”,认为它对阶级统治具有维系功能,所以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政权,必须夺取意识形态阵地,即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齐泽克则从人这一社会主体的生成过程出发,认为人就是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完成了自身构建,形成了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性,等等。

由此可见,尽管侧重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提出了意识形态在控制人们思想、为现存政权提供合法性、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等方面的作用。所以,他们虽未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都是在国家和社会运行的框架中看待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他们都阐述了意识形态对统治阶级掌握和运行国家治权的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呈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现存国家制度,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尽可能地提升统治阶级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控制能力。当然,从革命阶级的角度出发,革命阶级亦需要构建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推翻当权阶级的意识形态场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笔墨浓重,色彩鲜明。

如果说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从理论上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那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则在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12-1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等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功能。长征途中,毛泽东就曾说过“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5]，“文房四宝”代指思想和文化,正是作为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创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堪称典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弱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作用,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其准确把握国家历史发展规律、真正体现全民利益、引领国家发展方向、保障国家社会正常运转的建设服务功能就科学的凸显出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

可以说,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武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指导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只是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国家职能的重心也会随之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重心亦要根据国家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现实功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问题受到广泛重视。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是相对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而言的,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和社会运行方式的优化和提升;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是“统治”和“管理”的结合,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方面的转变。当然,无论何种观点,大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社会基本国情,合理借鉴现代治理理论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进程中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探索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升华”^[6]。其基本含义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发展,达到国家长治久安。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由其所属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即生产力属性和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党和国家之所以在继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根

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所做出的重要历史性抉择。在此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一方面,人民对国家治理要求更高,而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治理能力还存在着多种差异。所以,结合历史唯物主义中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需要发挥其在国家和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达到既能够指导和提升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又能够切实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活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所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首先,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志的思想化,决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国家治理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和实现过程。意识形态注重对社会发展总体框架的构建,国家治理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操作。所以,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影响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方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结构,实现组织动员、监督服务等治理功能,健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制度体系,完善法律、行政、财经、协商等方法体系,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和谐、协调的运行体系。总之,必须贯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理念。

其次,为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整合。统治阶级之所以将蕴含本阶级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推而广之,其目的在于把国家目标转变为社会价值追求,形成社会共识,规范社会行为,凝聚社会力量。对于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现实,又代表着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存在差异。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是广泛的,不同阶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这就需要有一个带有根本性、普遍性意义的价值标准,既能够为国家治理的总体任务提供价值导向,又能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提供共同的价值准则。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论断,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从国家、社会和个人3个层面为我国的国家治理、社会生活、个人行为提供了明确的价值遵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存在各种差异甚至冲突。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价值整合无疑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再次,为国家治理提供舆论导向。控制和引导舆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通过舆论引导,形成特定的社会舆论氛围,进而影响和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的作用,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加深,各种文化、社会思潮交锋日益频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各种冲击和挑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思想越是多元,就越要确立主导,越是多样越要凝聚共识,越是多变越要激扬主流。这就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袭,占领思想舆论工作的主阵地,同时又要善于尊重差异,汲取精华,为我所用。只有如此,才能为国家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营造有利的思想舆论环境。

最后,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认为,维护国家运转的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诸如教育、文化、家庭、宗教等都可以叫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有时蕴含在强制性国家机器中,有时独立行使国家机器的职能。因此说,国家治理作为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治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实践活动,其所采用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既需要政治、法律和制度等国家机器的刚性管理,也需要宣传、教育、沟通、协商和调解等意识形态工作的柔性治理。在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引导能够在“润物细无声”中解决国家治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从宏观方面看,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自觉性,为有效实施国家治理奠定

坚实的思想基础;从微观方面看,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沟通不同利益群体,平衡各种社会心理,以协商、协调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收获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援引西汉思想家桓宽的话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8]155}。应当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的历史性转变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引领国家治理方向,转变治理理念,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目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功能。

首先,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证国家治理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做出的正确选择,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论调有所抬头。邓小平同志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9]353},他用“没有硝烟的战争”形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可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顺利进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保证国家治理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必须而且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就是坚持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国家治理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切入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8]106}。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内核”和人民群众价值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合社

会意识,调节社会心理,形成价值共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时刻处于国家治理引领地位的基本支撑点。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当前国家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落到实处。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9]382},所谓“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时俱进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调整意识形态工作的视角,适应国家治理新变化。从性质上说,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党和国家主要任务规定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在推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及时调整意识形态工作视角,使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一是转变思维模式,及时调整意识形态工作重心。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在鼓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奋进的基础上,把转变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为着力点,努力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二是适应国家治理要求,转变工作模式。改变以往意识形态工作主要以自上而下的说教式传播,转变为上下协同,横向互动的工作模式,注重意识形态理论在人民群众中的自觉性传导。三是正视差异,区别化做好思想工作。面对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工作要根据国家治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分析各个领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解决不同领域、不同人群出现的不同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贯彻到底,反对把意识形态原则抽象化,反对“一刀切”“一锅烩”。

再次,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占领社会舆论高地。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地位,积极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造成冲击,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其实质在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出击、敢于亮剑。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二要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宣传主阵地,做好网络空间治理。在互联网日益融入百姓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4]⁴²是引导社会舆论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三要在具体工作中,自觉、主动运用意识形态的工作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⁵⁰²。只有把意识形态工作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把意识形态转变为“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才能将作为理论的“虚”与作为工具的“实”有效地结合起来,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实效性。

最后,用好意识形态方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关键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念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一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手段创新,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10]。将互联网+运用到意识形态工作中,能够拓展意识形态宣传平台,增加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更能够规范网络意识形态引导的时、效、度,有效地维护与改善网络舆论生态。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水平,解决好国家治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工作的最前端,广大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石,提升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确保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执政党的本质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强化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和服务意识,培养和提高基层工作人员职业素养,才能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更加科学、专业、高效的解决国家治理问题。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借鉴了现代治理思想中多方参与、多方式并用的先进理念,鼓励发挥智库、社工、志愿者等群体的特长,运用各种非强制方式,参与到理论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帮扶等国家治理的具体工作中,拉近与群众心理距离,掌握真实的社情民意,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国家和社会治理方案提供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

总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建构,又有实践操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目标和实现程度。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全面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特点和变化,全面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M]. 孔兆政,蒋龙翔,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朱向前. 史诗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78.

[6] 王浦劬.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策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6.

(责任编辑:许宇鹏)

